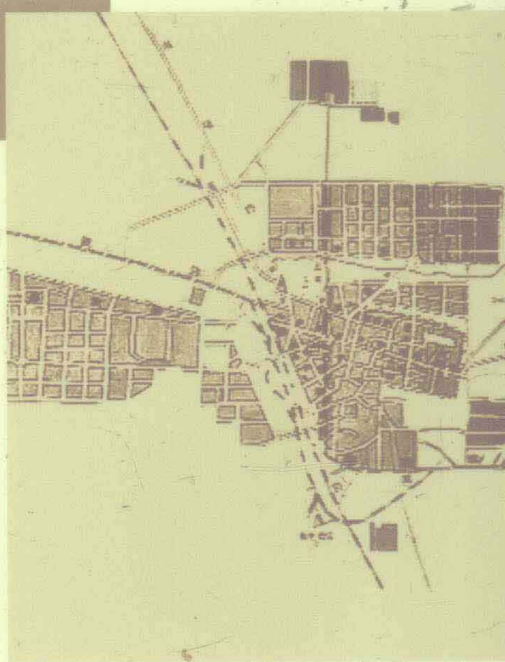


郑州历史

地理研究

Zhengzhou Lishi
Dili Yanjiu

陈隆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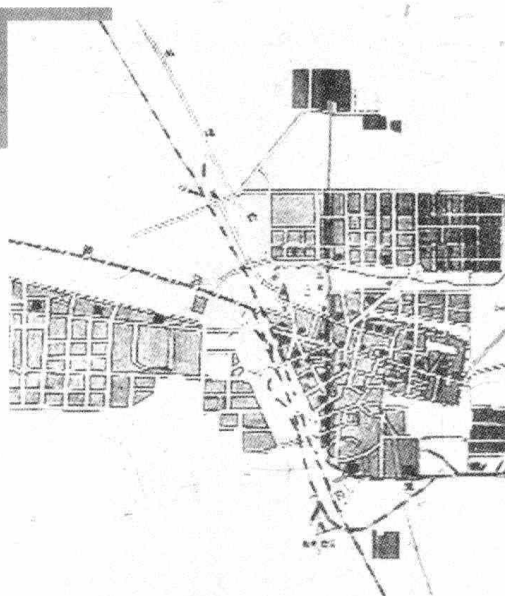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州历史

地理研究

Zhengzhou Lishi
Dili Yanjiu



陈隆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州历史地理研究 / 陈隆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04 - 9760 - 8

I. ①郑… II. ①陈… III. ①历史地理 - 研究 - 郑州市 IV. ①K926.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507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张玉霞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87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首部探讨郑州历史地理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围绕郑州古都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郑州与中国早期商业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郑州古代交通、郑州古代水系与湖泊、郑州地区古城与古国、郑州行政区划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初步构建了郑州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框架,首次对郑州及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作者简介

陈隆文，男，1969年生，河南开封人，2004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史念海教授。现为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郑州大学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经济地理、中国货币史和中原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在《考古》、《中国国家地理》、《人文杂志》、《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郑州大学学报》、《中原文物》、《华夏考古》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三部《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地理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先秦货币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和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

出版策划：任 明

封面设计：



GONGHEBOOK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王文超

副主编 刘其文 丁世显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任 伟 孙英民 杨焕成 李伯谦

宋豫秦 张松林 陈 英 郑杰祥

郝本性 阎铁成 韩国河

序 一

历史常常出现轮回。河南省在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直到宋代，基本上一直是处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虽然三皇五帝时期有尧都平阳（位于今山西临汾）、舜都蒲坂（位于今山西永济县）之说，以及西周、西汉和唐代曾以今西安为政治中心，但河南省仍处在重要地位。可是宋代以后，河南省完全丧失了其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特别是18世纪后，沿海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河南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更显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的经济和文化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故河南省在全国的地位仍相对落后，甚至还相对有所下降。但随着改革开放，河南省在全国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

郑州市也是同样有轮回。新郑是黄帝故里。郑州地区发现众多新石器文化遗址，还特别发现我国最早的古城遗址。夏代曾建都城于今登封的阳城镇，商代曾建都于今郑州市区。古代郑州市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但历史的发展曾一度使郑州的地位大大衰落。其地位最低时期甚至还不够一个县级行政单位。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的地位急剧提升。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郑州市的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其在全国的交通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也大大提升。

有关郑州历史地位的认识，也似乎有一个轮回的发展过程。最早是周武王在伐纣之后，周公旦通过占卜，确定洛邑为“天下之中”。周人又通过所谓测日景的方式把郑州市的登封阳城作为“土中”，即作为大地的中心。

《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把洛阳盆地的中心地位加以神化。“河洛”地区从此被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河出图，洛出书”之说，很可能是出自周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三河之地有两个地区位于今河南省。

由于从周公到司马迁，都认定郑州和洛阳地区处于全国中心的地位，长期以来，河洛地区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发祥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考古研究在全国的展开，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发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遗址等许多上古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存，学者们一度对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传统看法有所动摇。

但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提出和开展，河洛地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如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提出“多元一体化”的观点：“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为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曰多元一体结构。中原的华夏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其周围的第一层花瓣。”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赵辉教授认为：“自有夏以来的中国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存在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表层可以看出，这个历史趋势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即从所谓的龙山时代奠基下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6日）。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河南省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地域。

近年，我国研究第四纪的著名学者，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创立者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周昆叔先生提出“嵩山文化”，意在凸显嵩山和郑州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上古时期的历史地位。对于“嵩山文化”的提出，我很赞同。因为“嵩山文化”更能反映河南省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时期古城遗址分布的空间特点。虽然以前有“河洛文化”和“中原文化”等来表征河南省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特点，但“河洛文化”和“中原文化”所表征的地域范围并不很明确，因此，学者对其理解多有歧异。而“嵩山文化”所表征的地域概念相对较明确，更重要的是凸显了郑州在上古历史时期的真实地位。为了对“嵩山文化”的提出表示赞同，我还写了拙文一篇。拙文用四句文开首：

中华文明源中原，华夏之中在嵩山。

华人始祖轩辕帝，嵩山脚下寻故里。

此四句文既是与“嵩山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相呼应，也是为了突

出郑州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见拙文，载周昆叔、齐岸青主编《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令人高兴的是，郑州大学陈隆文教授的这部《郑州历史地理研究》，对认识郑州在古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衰落过程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论证。此话绝非是不负责任的奉承和溢美。该书我仔细地看了一遍。陈隆文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有深厚的研究功底，在这本著作中对古文献的解读，特别是对金文的解读，都表现出他的功底深厚和刻苦努力，同时，他还不辞艰辛进行了大量野外实地考察，如对虎牢关城、汜县县城、轘辕古道以及圃田泽等都作了认真和仔细的考察，因此，他在有关郑州的许多重要历史地理问题上，都有创新的见解。这些见解的论述及其学术价值，读者自可作出判断。我只想指出，郑州市域在三代及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确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上的地位，应重新认识。

郑州的历史地理研究，内容是很丰富的。特别是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和深入，会有更多的发现，也会丰富和扩展郑州历史地理的研究，还会进一步加深对郑州历史地位的认识。

我为郑州历史地理研究的进展而高兴，我更为郑州在历史进程中的新轮回的出现而祝愿，而高兴。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守春

2010 年 6 月 3 日于北京

序 二

初夏时节小满之次日，我应邀赴商都郑州参加“郑州中华之源嵩山文明研究会成立暨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揭牌大会”，下榻伊河路嵩山饭店。当晚隆文博士夫妇与王星光教授闻讯前来探望；隆文博士还将他的新著《郑州历史地理研究》书稿交我，促我为之作序。一见该书撰述的是郑州地区历史地理问题即引发我极为浓厚的兴趣。这既与我之专业研究有关，也深感这正是当前郑州嵩山文明研究亟须开展的一项基础性研究课题，不意竟被隆文博士着了先鞭，悄然间已先期推出了这部专著；很显然这对今后推进古都郑州与嵩山文明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于是在欣喜之际就当即应允了下来。

我之所以不揣浅薄乐意为隆文博士的这部新著作序，实际上还有一重原因。那就是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古都学会首任会长，也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就曾约请了几位学界同人，策划对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安阳、南京、杭州等几座大古都各自撰写一部历史地理专著。史念海先生等前辈学者作此擘划是深具慧识的。因为揆诸史实，我国众多古都之所以被选建及其在历史上之发展兴盛，纵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地理环境条件，即其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特征以及它们的变化却是基础和前提条件。这一状况，在几座曾为历史上主干王朝建都，且建都朝代多、历时长发挥作用显著的大古都中，反映尤为突出。因而将古都学与历史地理学结合起来，以几座大古都作为典型对象，开展古都所在区域之历史地理研究，无疑是极具多方面学术价值的，即对城市地理、城市史、城市文化、城市学研究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推进作用；而且还能对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城市环境保护、城市文化产业等项实际工作提供历史镜鉴。然而这项极富意义的学术研究与撰述工作，后因史念海先生的病重与辞世而搁置下来。近年来我的前辈师长、河南大学前校长李润田教授多次对我谈及此事，述及当年他也积极参与这一工作，并率先将古都开封历史地理一书之书稿写出，终因史先生辞世无人主理而未能出版。润田先

生敦劝我将这项工作促成。我虽十分心仪，但力有不逮，未敢贸然承担此责。今见隆文博士书稿，不禁怦然心动，预示着前辈师长们这项未竟之业将会重又启动，并获得丰硕成果；而且将会不限于我国八大古都，其他古都与各类城镇均可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同样可从中获益。

严格来说，隆文博士的这部新著还非系统全面的古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专著，而是就古都郑州历史地理方面几个最主要问题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之汇集；所以其书名为《郑州历史地理研究》，而非《郑州历史地理》，显然是深具用心，以明示本书之内容与特点的。当然这种研究与撰述角度的取向也是富有意义的。主要是可不受城市或区域历史地理专著总体架构的限制，可就先行需要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作深度的撰述阐释。自然，这些成果也就成为下一步撰写城市或区域历史地理专著的必要而有益的前期准备；隆文博士在这部著作中选定论述的几个问题，即古都郑州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中国早期商业文明关系以及古代水系与湖泊、古城与古国、古代交通、古代政区沿革等，均是全面深入研究古都郑州历史地理的重要问题。尽管对上述几个问题，隆文博士也未展开进行全面阐述，而是各就几个具体问题进行精深研讨，然而其所研讨的问题与获得的成果，已大为推进了古都郑州之历史地理研究。当然我也期待隆文博士今后继续努力，在古都郑州之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取得新的更丰硕的成果。

朱士光

2010年6月8日夜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4)
第一章 郑州古都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1)
第一节 郑州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及文明起源	(1)
第二节 天下之中与禹都阳城探索	(7)
第三节 有夏之居考辨	(30)
第四节 郑州小双桥遗址与商代庇都地望新论	(38)
第五节 敖山与颍都地望探索	(46)
第二章 郑州与中国商业文明	(57)
第一节 郑州西山古城遗址与中国早期商业文明	(57)
第二节 再谈郑州西山古城遗址与中国早期商业文明	(67)
第三节 从祝融部落的迁徙看郑州西山古城遗址的兴废	(74)
第四节 战国荥地韩币四考	(79)
第三章 郑州古城与古国	(84)
第一节 古郛国历史地理研究	(84)
第二节 商周管邑地望研究	(95)
第三节 古密国二题	(103)
第四章 郑州古代水系与湖泊	(110)
第一节 古荥泽考	(110)
第二节 黄河水患与圃田泽的湮没	(116)
第三节 黄汭水患与汭水县城	(128)
第四节 明清中原运河：大运河申遗不应遗忘	(145)
第五节 释《禹贡》济水“三伏三见”	(155)
第五章 郑州古代交通	(167)
第一节 虎牢关变迁蠡测	(167)
第二节 夏路与轘辕古道的变迁	(182)

第三节	金元以前郑、汴间的交通路线	(203)
第四节	黄河水患与郑、汴间交通道路的形成	(218)
第六章	郑州行政区划	(231)
第一节	郑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231)
第二节	郑州行政中心的转移	(245)
第三节	从行政区划看郑、汴、洛三城的关系	(255)
第四节	郑州行政区划沿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262)
后记		(263)

图 表 目 录

河南登封市告成镇王城岗遗址位置图	(24)
王城岗遗址与东周阳城遗址	(27)
西山城址位置图	(60)
西山城址北门平面图	(60)
西山城址平面图	(63)
图 2 - 1	(80)
图 2 - 2	(81)
图 2 - 3	(81)
图 2 - 4	(83)
图 3 - 1	(104)
图 3 - 2	(104)
图 3 - 3	(108)
图 3 - 4	(108)
圃田泽变迁示意图	(123)
元明清以来郑州、中牟间黄河决溢情况表	(126)
汜水县城关形势略图	(140)
汜水县形势略图	(141)
明清中原运河图	(148)
卫河水系图	(149)
贾鲁河—沙颍河—淮河水系图	(154)
济水水系图	(160)
虎牢关旧城址位置图	(177)
轘辕古道与夏文化传播示意图	(198)
郑汴交通变迁示意图	(217)
金元以后郑汴间黄河泛滥情况表	(219)
郑汴间的地貌与交通道路图	(223)
明泽陂图	(228)

第一章 郑州古都与中国 古代文明起源

第一节 郑州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及文明起源*

记得十多年前李学勤先生来河南大学讲学时，曾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认为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后来李先生的讲话内容写成文章在《人文杂志》公开发表^①，并引起大家注意。现在看来李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2000年7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及《考古》、《文物》、《历史研究》三大学术刊物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小型“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的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现已成为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新的重大课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问题笔者拟谈点看法。

第一，文明的定义与标志应如何理解？有人认为：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文明。陈淳说：“人工制作的生产工具、用火、绘画艺术、埋葬习俗及图腾崇拜都是文明的表现。因此，原始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②这应是广义的文明含义，我们所谈的文明应是狭义的文明。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③也就是邹衡先生所说的：“在一般

* 陈昌远先生旧作，收录时已作修改。

① 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见《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第3页。

② 陈淳：《从考古学谈人类的早期文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③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5年第8期。

情况下,文明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①其标志是什么?我们不同意将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应按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②。

国家的诞生就标志着文明的开端。应把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探讨先秦社会性质及其国家形态时,实际上就是探索古代文明社会国家产生于何时。近年来,许顺湛先生提出“五帝工程”,“我国历史上有过五帝时代”^③。曹桂岑先生也提出要“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④。这些实质上都是指我国以文明为标志的“国家”产生的历史已有5000年之久,文明与国家的产生应在黄帝时代。把文明与文明社会和国家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就应区别文明社会与文明因素的出现,不能把文明社会的形成标志简单地归纳为技术发展史上的几条因素,或把文明因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形成混淆起来,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第二,中国何时出现文明国家?应该说是在“黄帝时代”或者说是“五帝时代”。在这里应区分早期国家形态与晚期国家形态。“五帝时代”或称“黄帝时代”是属于早期国家形态,为部落酋长王国制的奴隶制国家形态。夏商周社会是属于晚期国家形态,为宗族宗法奴隶制的国家形态,这是非常典型的。

黄帝时代经过部落战争与融合,出现早期国家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局面出现,与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是分不开的。十几年前田昌五先生就提出一个新见解,他认为中国古代奴隶制形成于夏代之前约1000年,从文献记载看大约相当于黄帝到夏王朝建立时期。从考古资料看大约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⑤后来严文明先生也明确地提出,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我国各地特别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俱已达到新的水平。作为这一时期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夯筑或石砌城址普遍存在。这种种文化特征,恰与五

①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③ 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④ 曹桂岑:《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

⑤ 田昌五:《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见人文杂志编辑委员会《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第68页。

帝时代普遍筑城建国的现象相吻合^①。

由于我国古代存在许多不同血缘的氏族和部落，到黄帝时代，许多氏族部落迈向酋长王国奴隶制，各部落首领纷纷称王，因此不断发生战争。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这个时期我们同意田昌五先生的意见，应称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统一天下后，巡视各地，“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兴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奴隶制王国都城黄帝城。1995年9月25日，“首届全国涿鹿黄、炎、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涿鹿矾山镇隆重召开，大家取得了一些共识。考古学家郑光先生说：“我们国家在黄帝以前应该进入国家文明社会。”又说：“在我的术语里，国家不是一个部落社会，而是相当于一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自从黄帝统一了中国，标志着一种新王朝的诞生。也就是说，诸侯都来承认黄帝这种新政权的诞生，承认黄帝的统治权力。也标志着黄帝对当时一个版图很大国家的统一活动。”^②而且这时已有国家统治机构的建立。

黄帝时代国家政权机构设置很完备。《管子·五行篇》说：“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六相中有管理农业的司徒，管理粮食储备的廩者。《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集团有“九扈，为九农正”，实为管理农业生产和收获的官员。《管子·五行篇》还提到黄帝的六相说：“得奢龙而辩于东方……故使为工师。”即司工分管手工业等。《左传》昭公十七年还有少昊时期“司空”负责手工业的记载。《史记·历书》中说“黄帝考订星历”。《索隐》引《世本》及《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臯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路史·疏仡纪·黄帝》也说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事，命臯区占星，斗苞授规……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隶首定数……伶伦造律……大桡正甲子……命容成作盖天……命大容作承云之

① 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钱耀鹏：《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② 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